

乃至電話)的廣泛延伸，使地方社會密切地與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成為後者的一份子。

可以說，《農民日記》通過重點反映二十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運動對中國鄉村民眾的影響，折射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艱難與曲折的歷史。正如黃仁宇所說，在重分土地之後，不僅使政府以後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相當容易，同時毛澤東和中共也構成了一

種發號施令之體制，由以萬計的村民大會一直向上結合而成，由此創造了一個新的底層結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300)。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由國民黨製造的新型高層機構和由中共創造的新的底層結構，共同完成了對古老中國的現代化改造，從此，一個全新的現代民族—國家崛起於世界的東方。

從革命理想主義到政治現實主義

● 黃小艷

楊炳章試圖用「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解釋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在地域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這一轉變與長征期間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上台掌權同步發生。



楊炳章著，郭偉譯：《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以下簡稱《從革命到政治》)，引用只註頁碼)是美國歷史學家楊炳章(Benjamin Yang)於1990年出版的一本全面研究長征的學術專著，該書系統而全面地考察了長征的來龍去脈，並試圖建立一個研究框架或模式——用「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解釋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在地域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楊炳章指出：「從中共領導層的發展方向來看，二十世紀30年代中期是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向政治現實主義的時期」，或者說，是「中國共產主義政治化的時期」。「在整個轉變過程中的每一步、每

一時刻，是毛澤東走在前頭」。這一轉變與長征期間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上台掌權同步發生，而且正是這一轉變為中共提供了主觀方面的力量，這種力量與當時的外部因素相結合，導致共產黨人在二十世紀40年代末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頁8)。

此書的主要內容是對長征期間的有關史實進行描述和解釋，目的是對長征作一系統的介紹和分析。1948年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書，把長征同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結合起來加以分析。這一研究視角和分析方法擴展成了一種模式，後來的美國學者幾乎都加以沿襲。作者作為受費氏影響頗深的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學生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以新的方式向人們展示中共黨內權力關係的戰略走向」(頁12)，也是作者研究的立足點。

在這一目的指導下，作者在引言中對長征的定義作了說明。他指出，1934年末至1935年初，中共還在行軍途中時，紅軍的戰略轉移尚未被命名為「長征」。當時共產黨稱之為「西征」，因為中央紅軍撤出江西中央蘇區後正在向西部的省份進軍。「二萬里長征」一詞最早出現在蔣介石的一次講話當中，用來指他的國民黨軍對共產黨人的追剿。國民黨將領薛岳曾經率領國民黨第二路軍追擊中央紅軍，從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從江西沿路追擊，一直把中央紅軍追趕到四川。當他完成任務後，蔣介石曾經發表講話

予以讚揚。蔣說：「通觀古今，還沒有任何一支軍隊進行過這樣一個行軍兩萬多里的長征。今天，我們創下了這個紀錄，而創造這個紀錄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第二路軍的將士們。」(頁2)

中央紅軍結束長征幾個月後，毛澤東才開始使用「長征」一詞。後來在官方的表述中，長征的持續時間延長到1936年10月，把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長征也包括進去。但是，早在1932年秋季，由於國民黨發動第四次圍剿，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和賀龍的紅三方面軍就已撤離各自的根據地，開始遠征行動。「與此同時，還有2萬人的紅軍隊伍——紅四方面軍的三分之二，佔全部紅軍的將近一半——正在跨越黃河，『西征』新疆。歷盡千辛萬苦之後，這支西路軍於1937年初在甘肅遭到滅頂之災。除非是以成功為其先決條件，否則在此之前長征不應被視為已經結束。」因此，長征應該被定義為「一個跨越1932年末以至1937年初、長達四年之久的歷史運動。」(頁4)在作者的敘述中，長征不僅僅是指某個共產黨組織在短時期的某個孤立事件，而是置於與共產黨的主要軍事力量有關的、在更大範圍內的一系列錯綜複雜的事件。

這本書的一個特點是利用許多前人不知的文檔資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軍事上的模糊問題，並糾正了若干錯誤。例如，就李立三的冒險主義路線給中共帶來的損失，作者認為應該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作者用強有力的證據，證明

作者把長征定義為「一個跨越1932年末以至1937年初、長達四年之久的歷史運動。」它不僅僅是指某個共產黨組織在短時期的某個孤立事件，而是置於與共產黨的主要軍事力量有關的、在更大範圍內的一系列錯綜複雜的事件。

作者將遵義會議與中央長征的歷史背景和毛澤東的政治生涯聯繫起來予以說明，並以此為基礎，總結了中央蘇區前後中共的軍事路線。遵義會議是毛澤東取得黨和軍隊領導權的第一步。

在李立三完全控制黨中央的1930年4月到9月這段時間，無論是紅軍還是蘇區都在擴大。「1930年初，紅軍發展到7-8個軍，所有兵力大約4-5萬人。至1930年6月，又進一步發展到15-20個軍，兵力多達6-8萬人。8月初，黨中央號召對中心城市發動戰略進攻時，紅軍已發展為10-15個軍，總兵力已達8-10萬人之多」，而且在1930年後，紅軍打破了以前「沒有哪一支紅軍部隊能夠和國民黨軍的一個整旅(2,000-3,000人)打上一仗，也沒有任何一支紅軍能夠攻打並奪取縣級以上的大中城市」的情況(頁41)。

除了對共產黨發動起義有利的客觀條件之外，1930年初那些帶有濃厚地方主義和保守主義傳統的紅軍游擊隊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迅速增長，也是與李立三的鼓動和指示分不開的。因此「若把上述基本事實考慮在內，我們起碼應該放棄那種認為李立三的領導是完全失敗的觀點。李立三的悲劇在於，他過份迷戀革命理想主義的幻想，未能認清本黨本人在國內和國外被實際捲入的政治關係的現實，到頭來真可以說是功歸於人而過歸於己。」(頁43)

另一個問題是毛澤東與李立三路線的關係。作者通過對毛澤東與黨中央之間交換的兩封信件的研究，得出與以前「毛澤東是反對李立三路線」相反，或者說更準確的結論。作者說：「在李立三負責中央領導工作的兩年中，毛澤東與他的直接衝突只是發生在1930年4月至6月，因為在此期間，李立三試

圖直接指揮毛澤東的部隊。除此之外，毛澤東在行動上有意無意地與李立三路線相符合。」(頁47)但是作者還是指出，就其總體戰略思想而論，毛澤東倒確實是以李立三作為中央的反對者來看待的，毛澤東與李立三在基本思想上也存在着明顯的區別：前者注重政治現實條件，而後者強調革命理想原則。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在這裏還是以分析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關係為依歸的，並把它置於「革命理想主義——政治現實主義」的分析框架之內。

在第五次「圍剿」期間，中央六屆五中全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作者認為，就它們與第五次圍剿的實際關係來說，這兩次黨政大會對於共產黨人失大於得。它們沒有對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形勢產生甚麼正面影響，而軍事形勢卻正是當時決定中共黨人改變命運和前途的最具有實際意義的東西。從短期看，會議的召開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分散了必要的注意力；從長期看，問題更為嚴峻，它們造就了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戰略方針(頁92)。

關於1934年7月初開始的紅七軍團北征和紅十軍團西征的失敗，作者在談到方志敏的犧牲時這樣寫道：

中央蘇區領導人的最初目的是試圖以抗日先遣隊為代價擾亂敵後，解除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在紅軍主力放棄江西蘇區開始長征以後，方志敏的小股隊伍更成了佔絕

對優勢的國民黨軍的犧牲品……作為共產黨領導個人，方的悲劇在於起初他不知道自己行為的真實使命，最終他也不明白自己行為的真實效果。(頁100)

在這裏，我們心底翻動的情感，或許就不像先前那樣，只是對方志敏崇高革命氣節的崇敬和讚揚，而更多的是對殘酷鬥爭環境中個人命運的同情了。

對於遵義會議，作者不囿成說，將之與中央長征的歷史背景和毛澤東的政治生涯聯繫起來予以說明，並以此為基礎，總結了中央蘇區前後中共的軍事路線。作者通過對單純防禦路線與進攻防禦路線的比較，認為1931至1934年間，中央蘇區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是逐漸發生變化的，而不是突然從一個正確路線跳到一個錯誤路線上的。遵義會議對長征初期軍事路線的批評是不公平的，它把這一時期的行軍行動說成是「單純防禦路線更是沒有道理的。」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成了過去黨的正確路線的唯一代表、將來能領導黨和紅軍取得勝利的唯一人選。作者引用李德的話說，遵義會議是毛澤東取得黨和軍隊領導權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這個第一步使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逐漸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導權(頁138)。

由於本書的主旨在闡述中共內部權力關係的變化和策略方面的轉變，因此我們能在作者的分析中，了解蘇維埃和紅軍其他領導人如周恩來、張國燾、賀龍、徐向前、任弼時、張聞天等人的個人氣質，以

及他們之間的權力制衡是怎樣影響着黨內、軍內鬥爭的。

當然，本書着墨最多的還是權力的分配，尤其是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和張國燾的分歧，以及對領導權的角逐。這種分歧儘管開始得很早，但是自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以後，就進一步加劇了。通過蘆花會議，張國燾獲得了全軍指揮權，毛澤東在軍隊裏失去了所有的權力和頭銜。以後召開的沙窩會議使毛澤東和紅一方面軍保住了中央名義上的領導權，張和紅四方面軍在實際權力上則佔有優勢。又如毛澤東北上的提議獲得通過，可是卻由張國燾率領軍隊去執行。在作者的描述下，紅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矛盾變成黨中央和紅軍總司令部之間的矛盾，表面上比較統一，實際上卻更形對立。

於是，在張遲遲不肯北進而堅持南下時，毛澤東召開了巴西會議，建議立即率領部隊逃離，經過一天不間斷的行軍，毛澤東和其他人到了俄界的紅一軍處，他們召開中央會議，批判張國燾。第二天張國燾也在阿壩召開會議，批判毛澤東，然後帶部隊西南下，返回川康邊區。在張國燾紅四方面軍南下與毛澤東紅一方面軍北上的對抗爭執上，作者並沒有去判定孰是孰非，而是列出了雙方的觀點讓讀者自己去判斷，但從作者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爭執雙方是怎樣苦心孤詣地使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來贏得權力和權威的。當然，作者在以後的論證中，還是指出張國燾最後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其戰略方向不明。

在張國燾紅四方面軍南下與毛澤東紅一方面軍北上的對抗爭執上，作者並沒有判定孰是孰非，而是列出雙方的觀點讓讀者自行判斷，但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爭執雙方苦心孤詣地使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來贏得權力和權威。

作者認為，毛澤東作為政治企業家，在長征後尤其是開闢了陝北根據地以後，無論是面對盟友張學良、楊虎城，西路軍的領導人張國燾，還是他的競爭者蔣介石，以及中華民族的敵人日本侵略者，都能採取適時、適當的策略來擴大中國

共產黨的影響以及軍隊的實力，來鞏固自己在黨和紅軍的地位。因此，長征的意義就更加凸顯了——它不僅像黨史所描述的那樣，在於保存了紅軍的力量，宣傳了革命，還在於為革命造就了一位雄心勃勃的領導人。

農業社會的現代轉型困境

● 周祖文



傳統中國的統計數字不過是粗略的估算，無法將公共事務轉變成數字。為維持中央集權統治，解決之道是創造出一個完美的理想模式，將之標準化，再令各階層效法。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

1979年，黃仁宇被紐約州立大學解僱，此時，其成名作《萬曆十五年》的中、英文書稿即將出版。1980年

下半年，黃仁宇開始撰寫《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引用只註頁碼）。實際上，黃仁宇整個後半生的求學與學術經歷都是在回答前半生的一個用生命加以體驗的問題：為甚麼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了，而共產黨勝利了？或者用黃仁宇更有「大歷史」意蘊的話來說：為甚麼農業社會的中國面臨現代轉型時困難重重？

黃仁宇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它不能從數字上管理國家（頁9）。在把歷史往上推近四、五百年，黃仁宇認為從明代開始，國家的構造就從宋代繁榮的商品經濟退縮到立基於農村村落的層次上（頁374），傳統中國的統計數字不過是粗略的估算，無法將公共事務轉變成數字。為維持中央集權統治，解決之道是創造出一個完美的理想模式，將之標準化，再令各階層效法。如果產生實務上的困難，忠心耿耿及